

主持人语

周荣胜

比较文学研究最终要归结到比较诗学，而比较诗学是什么却还是一个有待反思的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代表人物，钱锺书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钱锺书对比较诗学的这一认识事实上成为大陆比较学界随后普遍遵循的原则。在这个旗帜下，我们的比较诗学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中西诗学范畴和总体精神的比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钱锺书自己的比较诗学实践，从早期的人化文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到鼎盛期的《谈艺录》《管锥编》和《七缀集》，始终没有采取这种两两比较的方式。目前为止，我们的比较诗学研究基本上没有超越钱锺书，甚至在有些方面存在明显的倒退，在具体的比较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背后的比较诗学观念更有可商讨的地方。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学术界普遍认为比较诗学研究的重心是“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化”等，但是，前者天然地蕴涵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后者天然地蕴涵着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比较诗学的学术空间因此被封闭。如果不突破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思想束缚，比较诗学的新天地难以拓展。

比较诗学首先是世界视域的诗学研究，不仅仅是中西文论的比较，更不应该限制在古典文论的范围内。比较诗学还有更广阔的领域，比如，国际诗学关系研究、跨文化诗学研究以及跨学科诗学研究等。国际诗学关系研究考察各种理论的跨国旅行。“旅行理论”的考察会涉

及相当多的层面，如人与书籍，接触的环境等，其中，理论翻译（诗学翻译及翻译批评）的研究是最有前景的领域。

诗学的跨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对文化一元主义的超越，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承认。如果一种文化、一种诗学从自身出发渴望他者的对照，那就已经证明其自性是非完满的，非自足的。一些学者在谈论中西文化时，援引文化多元主义思想，挪用其中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概念，认为中西文化与诗学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从而大力鼓吹文化本位主义，声称要进行传统诗学的转化，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甚至试图以中国文论为本建立一套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文论体系，在这里，“异质性”概念事实上已经变性为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标语，沦为一种一些文化孤立主义者的盾牌。比如，有学者幻想以《文心雕龙》来弥纶古往今来四方上下的文学，提出要以《文心雕龙》“情采通变”体系为基础建构“大同诗学”：“我们大可高举《文心》的大旗，以其情采、通变说为基础，建构一个宏大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体大思精虑周，而且具开放性，可以把古今中外各种文评的主义、理论都包罗在内，成为一个‘大同诗学（common poetics）’，一个文学批评的百科全书式宏大架构，这个‘情采通变’体系足以处理、应付、研究任何语种、地域、时代的文学。冰岛之小（甚至更小如瑙鲁），以至中国之大，其文学的方方面面，我们探讨时，都可用此理论架构，此方法学。”^①这样的共同诗学怎么可能不是一厢情愿的妄想呢？在当代这个确立了“异质性”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去寻求综合性、连贯性和普适性的一套理论体系无异于建造沙滩城堡、空中楼阁。

恰恰相反，真正的“异质性”是拒绝一切层面的“同一性”的，推崇单一的本质主义的多元主义是一种伪多元主义，不是百花齐放，只是一枝独秀。

比较诗学研究最关键的一步是如何摆脱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有

① 《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如何突破——从这个学科的方法论说起》，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上海，2002年）。

致地提出某个具体的诗学问题。问题只对应研究主体的视域而来，研究主体有多宽广的视域就有多丰富的诗学问题，有什么样的视域形态就有什么样的诗学问题。主体内部的视域充满着各种张力，本来就是多元和异质的，时刻变动着，视域的冲突并不一定是以辩证法的逻辑最后融合的，常常是以非辩证法的逻辑而错位断裂的。而研究对象是以符号形式呈现的，而符号都是复杂结构，其意义早已脱离原使用者的控制而撒播在社会文化之中，要在这些流动的、播撒的意义中攫取一二问题，离析出对研究主体认为有效用的一二问题，这需要比较学者具体而微的切割本领。我们认为钱锺书倡导的碎片思想就是这样的切割本领。他认为，所有大的文化体系作为整体最终都将土崩瓦解且将以零零散散的片段存在下去。中国文化是一座巨大宫殿的废墟，宫殿已不可居住，但其单个的砖瓦梁柱却仍能使用。西方文化依然。《管锥编》将中国文化拆解成无数单位观念，以无数的单个引文为出发点，然后，不分东西古今，不分学科界限，就一个个的单位观念进行打通研究，从而让我们以一种综合型的新眼光进入中国文化；如果用碎片原则来看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我们会发现问题恰恰不在他使用了阿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这个外来的工作平台切割了所谓中国文论的有机整体，而是他太相信这个框架的合法性，将切割了的中国文论碎片重新归整到这个框架中而失去了活力，于是，我们只能看到不太丰富的碎片，以及不太透彻的分析论证。

比较诗学并不是要追求一种普遍适用的、终结性的文学理论，只是围绕一些具体诗学问题做一种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如文学中的时间、空间问题，文论中的身体修辞问题，汉字诗学问题，叙事问题，描写问题，认知诗学问题等；研究的最终结论并不构成什么共同诗学，仅仅是一些局部的暂时的文学观念，比如，通感只是部分文学具有的特征，而且有通感特征的文学并不都是优秀之作，没有通感特征的优秀之作比比皆是。我们在重新研究通感问题时，应该站在巨人的肩上，广泛吸收钱锺书不可能看到的人文科学的各种新的思想，比如认知神

经科学对“感觉挪移”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可能比先前再跨出一步。

比较诗学的理想格局：像钱锺书研究“诗可以怨”“通感”“包孕时刻”等问题一样，比较学者每次研究都采用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域去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这个问题在单一的国别诗学领域内没有解决好，或者没有提出来，或者不可能提出来，而一旦比较学者在比较诗学内提出并充分解答，其成果的力量足以让它们自行返回到国别诗学内的工作者那里，照出国别诗学单一视域的局限，照出诗学问题的别样解答。

我们希望比较诗学研究能多方位地“回到钱锺书”，警觉一切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对比较诗学研究的束缚，践行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主义思想，让比较诗学在“共同诗学”之外自由生长。

或者碎片思想或者共同诗学，这是比较学者的首要问题。